



西方社会转型经典译丛 03

Die

第三帝国的国民净化

Belasteten

累赘

[德] 格茨·海达·阿利◎著
Götz Haydar Aly

励洁丹◎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累 赘

[德] 格茨·海达·阿利 著

励洁丹 译

译 歌德学院(中国)
翻译资助计划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累赘 : 第三帝国的国民净化 / (德) 阿利著 ; 励洁丹译 . -- 北京 : 光明日报出版社 , 2016.7
ISBN 978-7-5194-0343-0

I . ①累… II . ①阿… ②励… III . ①德意志第三帝国—史料 IV . ① K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4325 号

版权登记号 : 01-2016-4346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Die Belasteten”
© S. Fischer Verla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2013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was financed by the Goethe-Institut China
本书获得歌德学院 (中国) 全额翻译资助

累赘 : 第三帝国的国民净化

作 者 : (德) 阿利	译 者 : 励洁丹
----------------	-----------

责任编辑 : 梁永春	责任印制 : 曹 净
封面设计 : 李彦生	责任校对 : 傅泉泽

出版发行 :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 100062

电 话 : 010-67078242 (咨询) , 67078870 (发行) , 67019571 (邮购)

传 真 :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 :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印 刷 : 北京世汉凌云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 北京世汉凌云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450 千字

印 张 : 21.75

版 次 :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94-0343-0

定 价 : 5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亨利·K和露易莎·S——无名的逝者 001

001 | 为了在世的亲人而沉默

012 | 关于本书的说明

为了减轻良心的谴责 014

014 | 死亡协助，俗世的观点

022 | 于亲属而言：一项保密措施

028 | 于医生而言：起草安乐死的法律

032 | 未婚妈妈芙丽达·维斯是如何救回儿子的

T4行动，公开的秘密 039

039 | 对病人的“计划经济式鉴定”

044 | 蒂尔加腾街4号不起眼的谋杀机构

047 | 在阳光灿烂的某一天收到了装有骨灰盒的包裹

053 | 一位亲和的医生、改革家和屠杀者

059 | 凶手们的物质化动机

在柏林被转移，消失，被遗忘 063

063 | 病人就像猪一样被刻上标记



- 067 | 无论何时都要同意出院申请
- 071 | 灵活而高效：凶手们的权力分工
- 075 | 服从命令、借口、沉默和抗议

来自众多毒气室的报道 080

- 080 | 他们想把我们清理掉
- 083 | 我正处在死亡转移中
- 086 | 我没有到铁门后面去
- 088 | 大部分人都“注意到发生了什么事”
- 090 | 今天是艰难的一天
- 093 | 将来“会有人揭开这些医院的面纱”

转移，战争和谋杀病患 096

- 096 | 给转移人员当作临时住所的医院
- 104 | 用以安置德国移民的550家教会医院
- 107 | 提供给国防军的冬季固定宿营地

畸形新生儿的鉴定 115

- 115 | 为了进行致命医疗而做的早期识别
- 120 | 死刑：年龄14.8，智龄8.6



124 | 屠杀者规划建立舒适的儿童医院

用于先进科学的儿童大脑 127

127 | “国家委员会的物资”，急切的需求和利用

136 | 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和哈勒富尔登

儿童医院日常诊疗中的安乐死谋杀 149

149 | “这个孩子完全适合进行治疗”

154 | 注射死亡针剂是专业医生培训的一部分

159 | 在校女护士也了解此事

冒险的治疗：给父母的选择 165

165 | 儿科医生要查明父母们的意愿

170 | 最后一次尝试？好的，您姑且一试！

最后的童年生活印记 175

175 | 他的面部表情总是非常生动

176 | 因为科学目的而在当天被害

182 | 我在这个医院一点都不快乐

183 | 很开朗，非常受欢迎

188 | 我想家

T4行动的突然中止 190

190 | 加伦主教和上帝的刑事法庭

200 | 精神病疗养院和护理院帝国专员

对生者和亡者的研究 211

211 | 一个有着全新人类的全新时代

218 | 海德堡“针对白痴病人的死亡指令”

224 | 基础研究，T4行动的一项任务

反社会者，罪犯，肺结核病人 233

233 | “消灭反社会的生命”

241 | 鲁美尔斯堡——关于社会异类人群的问卷

253 | 斯塔德罗达的“反社会的肺结核传染病人”

261 | 告密者，凶手和疯子的真相



帮助受伤者，谋杀疯癫者 266

- 266 | 尽量充分利用现有床位
- 270 | 护士和护工对病人进行评判
- 278 | 精神病疗养院内的火葬室
- 287 | 人们对于谋杀行动知道多少？

来自死亡之屋的报道 294

- 294 | 他们能在这里悄悄地饿死我们
- 296 | 没有人能回去
- 297 | 一位幸存者在1945年秋从哈达玛寄出的报道
- 299 | 我不想被烧死
- 300 | 我们不再知道什么是爱
- 302 | 毁灭之夜后的报道

被害者的信息 305

- 305 | 博登湖边被遗忘的骨灰盒
- 310 | 参与其中的亲属们
- 317 | 罪恶的魔力

后记 322

322 | 终于，在32年之后

324 | 一项论证充分、但最后落空的建议

327 | 成功的历史政治行动

330 | 剽窃现象的盛行

缩写 335

亨利·K和露易莎·S——无名的逝者

为了在世的亲人而沉默

1935年到1945年期间，有将近二十万德国人死于那场安乐死谋杀。谈及此，当时的许多参与者都委婉地称之为解脱、终止生命、悲悯死亡、死亡协助，或甚安乐死。他们表现得讳莫如深，但这确实是在当时社会发生。尤其是在战时，很多德国人都赞成残暴地杀害那些“无用的吃白食者”；只有少数人认为这完全是一场谋杀，而大部分人则羞愧地保持了沉默，完全不愿详细地去加以了解。这样的谋杀一直延续到了1945年之后。只有偶尔才会有家庭记起他们那些被谋杀的阿姨、孩子、兄妹或祖父们。这样的禁忌直到七十年后的今天才被打破。那些曾被遗忘的人们慢慢又被提及，而他们当时之所以不得活，就因为他们被认为是疯子，是累赘，让人觉得羞愧，因为他们是不正常的，会危害公众，没有劳动能力，或者离不开别人的照顾，就因为他们成了家人的污点和负累。

直到今天，在众多活动、书籍和纪念碑上都不曾出现过那些被谋杀者的名字。人们提到他们的名字时都小心翼翼、闪烁其词，只用亨利·K和露易莎·S来表示，或者随便取一个化名。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按照联邦档案法，所有档案中记录的、逝于1945年5月8号

之前的人，无论他们是因何而亡，其名字都可以被公开。联邦政府数据保护专员告诉我：于死者而言，不存在任何数据保护。但他认为我们应该考虑到现在还在世的那些亲属。他们可能会觉得因此受到伤害。而联邦档案馆馆长在2012年对我提出的质询也给出了类似的答复。^①

可是，我们不禁要问，谁家的远近家族圈中就没有那么一个不正常的人呢？这是一种耻辱吗？难道隐瞒那些因暴政而被杀害者的名字不更令人羞愧不安吗？我认为，现在必须重提那些逝者的名字，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些残疾者、智障者和腿脚不便者，他们被人遗弃，不得苟活，可他们并不是无名的非人，使人不得不出于羞耻而隐瞒他们的名字，或者任由其暗藏在医疗机密中。他们也是人，也许无法劳作，可他们会笑、会痛、会哭——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独立个体。

现在是时候去实名地尊重那些被谋杀者了，我们应该把他们的生平数据都归列到一个向大众开放的数据库中，只有这样，那些早已被遗忘的被害者至少能够象征性地重新获得其个体性和人的尊严。那些毫无抵抗力、被阴毒地谋害的人们，得了慢性病、神志不清、身体或精神不全的人们，出于种种原因，而且多数只是因为贫困和被遗弃，当年不得不生活在疗养院里。我们不该再对此讳莫如深。少数人打破了这种令人羞愧的沉默，希格丽德·法尔肯施坦因便是其中之一，她在2012年那本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安娜的痕迹

① 联邦档案馆（霍尔曼）在2012年7月10号对作者给出的回复；联邦政府数据保护专员（沙尔）在2012年7月17号对作者给出的答复。

——一位纳粹“安乐死”牺牲者》中描述了自己的阿姨安娜·雷恩科林的命运，安娜在1940年3月7日葬身于格拉芬艾克的毒气室中。

与之相应的，在被害者的后辈中，零零散散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对此进行调查，从2011年到2012，皮尔纳-索能斯坦因纪念馆收到的被害者家庭成员发来的询问信数量就翻了一倍，从48上升到了95。^①

（在索能斯坦因纪念馆的地下室里，当年曾建过一间毒气室，1940年6月到1941年8月，这里总共有13720名精神病患者被害）与逝者的庞大人数相比，询问信的数量可能微不足道，但这却表明，人们的兴趣和内心态度开始有了显著的改变。其中的原因可能也在于，相关的文献不再主要关注谋杀者，而是越来越多地注意被害者，比如波利斯·波姆和丽卡尔达·舒尔策这本饱含深情的著作《<…在我们所有人的记忆中仍栩栩如生>——纳粹“安乐死”疗养院皮尔纳-索能斯坦因中牺牲者的生平》（2003）便是其中之一，又比如埃尔维拉·曼特因（娘家姓赫姆佩尔）自费出版的这部震撼人心的传记《赫姆佩尔传记——一个从毒气室逃生的德国孩子的命运》（1994）。我在“来自众多毒气室的报道”一章中会引用上述两本著作中的内容（本书德语版原文第78页及以下）。

受到这些作品的激发，我在2012年9月1日《柏林日报》和《法兰克福评论报》的专栏中向读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您知道，或者感觉到您家里有这样一位被谋杀的亲人吗？如果您能在一个纪念数据库中查阅并确切了解此事，难道不是件好事吗？最起码让被害

① 感谢皮尔纳-索能斯坦因纪念馆负责人波利斯·波姆提供的信息。

者的姓名重见天日，这难道不是人类的某种基本信条吗？请写信告诉我们您的想法。”

毫无例外地，我收到的都是肯定的答复。这里选录了其中一些来信。读者梅莉·霍赫胡特写道：“这个专栏让我陷入了沉思。我想起我父亲几年前曾谈到过一位姨婆被害的事，她曾在一家精神病医院呆过。我查阅家族档案后并没有发现任何和这位姨婆生平相关的信息。就算在我们家里也没有人公开谈及她或在文中提及她。我非常支持为“安乐死”牺牲者建立一个公开其姓名的（就像纪念犹太人的数据库那样）公共纪念数据库。”

罗塔尔·维瑟写道：“我的家庭也曾直接受到纳粹时代残暴的安乐死谋杀影响，受害人是我的外婆。她有精神分裂症。可惜我迄今对她的生平仍知之甚少，而我唯一知道的一些信息，也是我母亲多年前跟我说的。我的外婆叫希尔德·斯特洛夫尔，出生于多特蒙德，出生年份大约在1905年到1908年期间，是矿工家庭两个孩子中的老大。（...）大约在1940年初开始，她患上了精神疾病，她的异常行为日益明显，开始引起了别人的注意。有一天半夜里，她叫醒了自己的两个孩子，穿着睡衣就慌慌张张地带着两个惶恐不安的女孩奔走在墓地里。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多次，而这种异常事件自然引起了邻居的注意。过不了多久，有关当局就采取了行动。最后，她被送到了相应的“专科医院”，据说是在累根斯堡附近某处。她的生命在那儿终结，那应该是在1943年的某个时候，那时她刚好35岁左右。她的父亲还曾试图把女儿从那个死亡医院中救回来，但最后却都是徒劳。”

莱纳·阿斯曼提到他的曾祖父埃米尔·塞夫科夫：“1943年，我的曾祖父在乌克兰蒙德的精神病疗养院成了这一行动的牺牲品，在对曾祖父做了相关调查之后，我们联系了原疗养院，现任主任医师克里维帮我们找到了原来的医疗档案，在曾祖父65岁忌辰那天，我们，包括我们16岁和18岁的两个儿子，以及在当地的父母一道，去了趟乌克兰蒙德来纪念他——这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历。”

博客名为“sg”的读者对此问题的回复是：“我大力赞成公开这些纳粹专制统治牺牲者的名字——事实上很多家庭都不太敬重这些人。我在我们家曾亲身经历并且现在还在经历文章中所描述的这种态度。我的母亲现在98岁，她有一位姐姐曾在1942年因躁郁症被送到柏林附近的一家精神病疗养院治疗，当时她大约30岁。四天之后，她的父母收到消息，说她死于心力衰竭。但她之前的身体却是非常健康的，因此，她极有可能是死于安乐死谋杀。然而，在当时那么个大家庭里（我母亲有十一个兄弟姐妹），没有人想要去追究这件事。我姨妈的父母那时深受空炸折磨，也因着照顾躁郁症的女儿精疲力竭，并不想（据我所知）去追究女儿的猝死——或许是出于羞耻感、沉重的负担或正常的恐惧？这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这个家庭的众多后辈中，就我所知，在我们这一代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对此做过调查，尽管我们大伙都知道这一显而易见的事，也就是我们的姨妈是被纳粹谋杀的。我本人——首先是考虑到我的母亲，她总是回避这个话题——也没有为此采取过行动。直到现在，她的姨外孙女（我们的女儿）才试图搜集资料和回忆来调查这件事。我的母亲尽管年事已高，但是记性仍旧很好，她接受了孙女的访问，而且

还提及了资料和名单，这些资料上记载了牺牲者的姓名和他们被转移安置的每一家医院的名称。现在，我们（牺牲者的众多后辈）才终于开始考虑要用什么方式来纪念我们的姨母。文中提到的纪念数据库应该也是迈出这艰难步伐的一种可能。”

约尔根·伯尔曼提到：“根据索能斯坦因纪念馆的资料，我们的祖母，赫德维希·米娜·舒斯特，是在1940年11月12日在那儿被毒气毒死的（死亡证明上的日期却是11月21日——当局早把这九天中支付的医疗保险收入囊中了，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中，这也是司空见惯的）。直到1995年，我们的父母和姨母们都没有开口和我们这些孩子谈起此事。他们去世后，我凭着自己的本能感觉对此事做了调查。1995年，我在德累斯顿无法得到关于索能斯坦因这一安乐死机构的任何信息。2001年报纸上报道了该纪念馆开幕的消息，随后，我参观了该馆，直到那时我才确定，我的祖母和艺术家埃尔弗丽德·罗瑟-维西特勒，以及当时因拒绝战时服役而被捕的认信教会律师马丁·高格尔，在从察德拉斯（位于莱比锡附近）‘移送’到索能斯坦因的当天就被害了。除了死亡证明之外，我们能看到的关于祖母的资料就只有转移人员的‘移送单’。”

这些信件，以及之前和在安乐死中被谋杀者的后人们进行的谈话，让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更坚信，我们虽一方面为众多的牺牲者哀叹，另一方面把将近500名穿白大褂的纳粹凶手恶魔化，认为他们是毫无良知的骗子、恶徒或凶手，但这是不够的。对社会环境的质疑，对那些处在间接凶手和间接被害者之间的普通人提出质疑，

这是有深远意义的，可能也是颇具教益的。因此，我为这本书选了《累赘》这一具有多重含义的标题。该词针对的并非凶手，而是那些被害人。它指的是那些有“遗传”或“精神疾病负担者”及其“背负累赘的家庭”；它涵盖了“负累”、“多余的存在”和“社会负担”这些概念，同时也指那些成为某人“负累”的人或——现在大多反过来表述——“不愿拖累他人的人”。《累赘》这一标题包含了那些被害人，但同时也指其亲人的“生活负累”以及由此带来的想要“减轻负担”的需求、想要“摆脱负累”的个人需求和集体需求。

在我的家族中，我就知道两个和安乐死谋杀相关，但却截然不同的故事。其中一位叫玛尔塔·艾伯丁，出生于1906年，1957年在伯特利基金会社会福利机构去世。她患有严重的癫痫病，也因此性情大变。在她的侄女们看来，她是个“瘦小、穿着灰色衣服、阴郁又神秘的人”。她曾被送到柯克尔疗养院。在她要被送走时，那儿的护士及时通知了玛尔塔的亲人，而她的哥哥，弗里德里希·艾伯丁牧师，当即把她从疗养院接了出来，过后才再送回去。1944年末的时候，他写道：“我们在1944年9月22日把亲爱的玛尔塔送到了比勒菲尔德附近的伯特利。伯特利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很高兴把玛尔塔送到这么好的地方。……”尽管如此，关于玛尔塔阿姨的话题在我们家却向来“总是禁忌”。

而第二个故事则是我母亲在她2008年过世前不久讲给我听的。她特意提到了已然亡故的好友安娜玛丽。当年，她迫于丈夫的压力，同时也因为长期承受着痛苦，把自己残障的宝宝送进了一家安

乐死机构。我不知道那是个女孩还是男孩，他/她姓克罗赫尔。目前为止，我所做的与之相关的调查都以失败告终。

姨夫的妹妹，玛尔塔阿姨，以及这个姓克罗赫尔的孩子，这两位都不是我的近亲。如果要找出其中的最终关联的话，那么，现在年龄超过25岁，并且其祖籍在1900年之后都在曾经的第三帝国的话，每八个德国或奥地利人中，至少就有一位和这样一个因身为“无用的吃白食者”而在1939到1945年期间被杀害的人有直接的亲属关系。这一结论是根据什么——保守而言的——事实得出的呢？安乐死的200 000名牺牲者是在1940到1945年期间被害的；他们的平均年龄是45岁。^①也就是说，他们大多出生于1897年。因此，2012年时现年25岁的后辈就是其第四代后人。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被害人便是其曾祖辈的亲人。

我们来举个例子。我们虚构一个出生于1897年的先人威廉，并假定其有三个兄弟姐妹。这四位就构成了第一代。而这一代人每人平均生育2.1个孩子，用不怎么好听的统计术语来说便是队列生育。那么与之相应的，平均出生年份为1927年的第二代便由8.4人构成，而其平均后代也同样是2.1人，那么，威廉就又多了18个后人。到了出生于1957年前后的第三代后人时，平均每人生育的孩子则下降到了1.4。按照这个生育率，到1987年，威廉就有了25个曾孙、曾侄外孙和曾侄孙女。我假设，其第三和第四代后人及其亲人都健在，平均出生于1927年的第二代后人中还有两位尚在人世，而平均年龄25岁的第四代后人在2012年还没有孩子。那么，到此时，安乐死

① 被害者的平均年龄我是根据施尔特的《没有人性的裁量》（1999）提出的，见该书第153页。